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相关权威部门审定通过

新中国十七年

〔下卷〕

毛泽东



领导下的

贾章旺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014044382

K270.6

46

V2

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十七年

(1949—1965)

下

贾章旺 著



k270.6
46
V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航

C1732367

第五章 庐山会议

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周恩来提名彭德怀接替自己，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政治局会议批准，彭德怀走马上任，并提名调黄克诚任副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时任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治疗休养，由第一副参谋长聂荣臻代理），认为毛泽东管的事太多，太忙，事无巨细的文件都报上去不好，从那时候，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文件就少了。后来毛泽东开会说，早先还见着作战部的报告，后来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①粟裕当时是第二副总参谋长，他认为自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便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批示说：此种检讨很好。且把粟裕与聂荣臻的工作做了比较，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又批评了聂荣臻，引起了聂荣臻的误解。

1953年1月，毛泽东要求：“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②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③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

① 张震：《总参谋部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4页。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粟裕与彭德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准备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有时据理力争。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规定的又不具体。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经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为此，粟裕提出，希望加以明确，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上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在署名问题上，引起彭德怀对粟裕的猜疑。^①

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1950年7月，刘伯承辞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来到南京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6年多的呕心沥血，一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由刘伯承打造得颇具规模。在“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许多苏联军事人员任教官，连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都按照苏联的一套。在批评教条主义倾向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此时，军事学院战役系一位学员给彭德怀写信，认为在向苏联学习中，学院在教材、教学方法上，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

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在调军事学院之前，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门的处长。蔡铁根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上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情况；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

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军委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集多次座谈会，随后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在肯定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同时，同时指出，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

彭德怀看了报告，并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于1957年2月27日率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包括2名大将、3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回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取得了许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I（1956—1966），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2版，第242页。

多成绩；但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在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

这一报告由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参加了。萧克不同意报告的结论，认为把南京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不合适，认为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此时的训练总监部，在彭德怀眼里已是问题成堆，已经传出了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彭德怀在一个公开场合曾一锤定音地说到过：“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训练总监部。”萧克给彭德怀写了一封解释信，不料，这封信成了萧克“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了，挑到彭总头上了”。

这时，刘伯承正在北戴河养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观点鲜明地表示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数月之后，刘伯承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诚恳请求辞去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他的辞职，任命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委。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委婉地陈述，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讲到军队问题时，提出要警惕发生苏联“朱可夫事件”。

朱可夫，是苏军元帅。在苏德战争期间，是仅次于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战后，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去世后，他再度崛起，出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朱可夫当即表示坚决反对，说：“军队反对这项决议，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不会开动。”赫鲁晓夫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击败了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但是，朱可夫在军队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罪名，解除了朱可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职务。

毛泽东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4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①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29页。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他提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事工作。

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开始支持萧克意见的占了上风，并对原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现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开展尖锐批评。但是，会议快结束时，总政治部派来了由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宣布：训总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

1958年4月8日，曾主持训练总监部多年的叶剑英在军事学院教职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肯定了军事学院工作的成绩，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

1958年4月29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有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提出军队整风的指示，确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身在北京的总参谋长粟裕。

1958年5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又称“小型会议”）。到会人员40人（军委委员，军队系统中的中央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书记共56人）。

26日，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7位元帅及黄克诚、谭政两位大将和萧华参加。彭德怀提出，会议要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会议责成粟裕做了检讨。然后，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等人发言对粟裕进行批判。

5月27日，会议正式开幕。彭德怀在会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大放、大争辩。会上，就“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①

28日，粟裕被迫在50多人参加的会议上进行检讨，会议气氛比较缓和。毛泽东认为会议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使会议在一周之内空气紧张起来。

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有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

^① 所谓“告洋状”，是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事情。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正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名材料”，以作为参考。

质垮台的危险。^①

自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全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达到1400多人。大会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批判的调门一再升温。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征求对粟裕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赞同。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党的;到北京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全认了下来。毛泽东对粟裕的评价也传到了会上,他总算过了关。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将他的“错误”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②

1958年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就军委扩大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我认为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发展;我军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署,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6月5日,毛泽东看了方强的信后,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个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③

6月7日,毛泽东又专门给邓小平写信:六七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

①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② 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追忆粟裕同志》:“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1—263页。

键是本月一个月，大事抓起来。^①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都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不来）。

1958年6月20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会议的代表1004人，列席的438人，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会议移到中南海怀仁堂。

彭德怀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从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到全国胜利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反对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彭德怀带着情绪说：“我这个人是没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②

八届五中全会新当选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神情颇为激动地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而只列为参考资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6月21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彭德怀的批评，也就是对我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毛泽东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分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照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举行座谈会。

毛泽东在插话中说：“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者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毛泽东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4页。

②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宁主义不是要停止的，是要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时机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毛泽东说：不能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不能否定“小米加步枪”，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既要有洋办法，也要有点土办法，我们打败了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看不起自己的经验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还要研究敌情、友情；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办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毛泽东说：“现在学校奇怪的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①，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毛泽东直接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语气略有加重：“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1930年10月从苏联学成归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1年12月上旬，刘伯承进入中央苏区后，始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5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同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从前线返回。1933年2月，刘伯承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先后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对德国法西斯进行的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攻克柏林等十大战役。

“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批评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指斥这种战术的最大害处就在于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彭德怀、林彪等人在读到了这些文章后，以他们自井冈山以来追随毛泽东、朱德对游击战争的深刻领会，对刘伯承这种偏颇的认识很有看法，认为在这种时候打正规战完全脱离了红军的实际。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深为不满。林彪也倾吐出心中的不快：“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红军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我们就靠这个拿手好戏。现在好了，要打正规战，拿什么与人家相比？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名义上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前方局指挥，但博古等人一来就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提出红军渡过赣江首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攻南丰，并要求“前方同志必须站在一致的路线上，绝对地执行这一战略计划”。周恩来等人经过了认真的分析，很不赞同这种战略，几次电告博古，反对攻打南城、南丰。而博古和项英、任弼时等后方局成员根本听不进去，于1933年2月4日语气严厉地电告周恩来等：“此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在这种情形下，前方局只得于2月7日作出攻打南丰的部署。周恩来愤慨地与朱、王联名再次电告临时中央，表达自己的心情：“应该给前方局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

担任主攻南丰的是红三军团。彭德怀在接到命令后大为震惊。周恩来也有难言之苦，只能相劝：“彭军团长，这是中央的决定，命令都下达了，还是打吧。”“打吧，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彭德怀怒气冲冲地放下了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2月12日傍晚，红三军团向南丰城发起攻击，守敌凭借坚固工事猛烈反击。红三军团激战大半夜，城外的敌堡摧毁尚不及一半，就伤亡了400多人，牺牲三师师长彭放和两个团长，红军的进攻完全被敌人的火力所压制。

彭德怀接到报告，心如刀割，一夜就折损了400多名官兵，这可是红三军团经受不了的重创呀！他跺着脚骂道：“照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本都要打光了！吗子正规战、攻坚战，全是刘伯承在瞎指挥！由着他这样搞下去，我们打得个鬼赢？！赶快给我撤！”周恩来等人了解到战讯，也是心痛不已。更为严重的是：增援之敌已纷纷出动，企图从三面合围攻城的红三军团。面对攻城红军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前方局当机立断，不待请示临时中央和后方局，就传令红三军撤出南丰战场。

其实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也是不赞同强攻南丰的。他认真研究过周恩来于1月21日发给后方局“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的电报，认为前方局是有发言权的，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当夜，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项英讲了，但他们听不进去。不过，彭德怀对此毫无所知。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人拿出无畏的勇气，毅

然作出一系列调整，指挥红军开展灵活的游击战，最终取得了歼敌3万、俘敌逾万的重大胜利。彭德怀不明刘伯承反对强攻南丰的真相，因而把这一错误的战略指挥，算在了刘伯承的头上。战后，彭德怀对刘伯承批评“游击主义”大为不满的这些话，传到了刘的耳朵里，这位总参谋长并不怎么生气，却也说了一句：“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不料，话又被传播者传走了样，彭德怀听了以后，增加了恼怒。

事实上，刘伯承进入红军作战指挥的核心圈之后，当初发表对“游击主义”的批评文章，其心地和动机是希望红军能够提高战略战术水平，因为他基于自己的军事阅历，一贯重视部队正规战的战略战术素养的提高，以适应反“围剿”战争的需要。然而，攻打南丰受挫和第四次反“围剿”的最终获胜等铁的事实，让他认识了过去对游击战的看法有所偏颇，承认中央苏区之所以接连四次打破敌人从10万到40万兵力的“围剿”，完全来自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和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不然的话，中央苏区早就不复存在了。他的反躬自省是真诚的，因此思想上的转变也是真切的。所以，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主宰苏区军事指挥的“太上皇”期间，刘伯承对其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一套持反对态度，只要有机会，就主张把游击战术的经验运用到作战中，力求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1934年5月10日，他在《战斗》杂志上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一文，呼吁般地提出继续用“诱敌深入”的战略与敌人战斗。9月10日，他又撰写了《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以更深的认识阐述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刘伯承对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红军特点和苏区战争规律，只会“图上作业”的瞎指挥非常反感，在职权范围内屡屡纠正李德的错误部署，以至于洋顾问对他非常恼火，甚至当众讥笑他，说他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还是红军的总参谋长，水平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事后不久，临时中央免掉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事之中，刘伯承没能主动找彭德怀交流看法，解释前嫌，消除隔阂。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与刘伯承的职务发生了一次置换：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昔日的上下级关系颠倒着变化了一下。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高干整风运动，按地方和军队系统召开会议，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由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后来召开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4月30日上午，由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抗战加以全面总结。刘伯承的报告涉及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敏感而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怀策划并一手指挥的一个区域与时间跨度很大的战役。八路军出动105个团40万兵力，在广大民众的配合下，经过

连续3个月的艰苦作战，歼灭日伪4.3万余人，拔除敌方大据点近300个，破坏了正太、平汉、同蒲等公路、铁路交通线，打破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日军向西北、西南进攻的后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妥协的逆流，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刘伯承在报告中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这些缺点除了战役发生后一两年相应暴露出来的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事实上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忙，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等等，还提到了指挥上的失误问题，包括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百团大战期间，一二九师作为正面作战的八路军主力，担负着收复榆社、辽县，破击白晋公路、正太铁路等艰巨任务，与其他部队相比，兵力损失较大，而且有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

1940年10月30日，一二九师的6个团在彭德怀严令下汇集蟠龙镇关家垴，围歼日寇冈崎大队。该敌蹿至黎城的黄崖洞山谷时，部分破坏了八路军兵工厂，彭德怀下狠心决定全歼这支恶敌。扼守关家垴的600余名日军火力极其猛烈，压制了一二九师部队的多次进攻。彭德怀下令再次强攻。刘伯承急了，在电话里说：“彭总，不能这样打，这种攻坚太不值了，到了晚上再收拾他们。”彭德怀在电话的另一端则喊道：“不能等，一定要现在拿下来！”刘伯承来火了：“你这是赌气，蛮干！”彭德怀听了也咆哮起来：“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你一二九师的番号！”说罢扔下了电话筒。刘伯承这时也非常气愤，眼泪都溢出来了：“这个彭德怀，真拿他没有办法。”在彭德怀的指挥所，左权严肃批评了副总司令彭德怀。彭德怀意识到自己错了。

一二九师反复进行了十几次冲击，以不小的伤亡攻克了关家垴，基本歼灭日寇冈崎大队，但伤亡也超出了日寇数量。战后，彭德怀见到刘伯承，握着他的双手满怀歉疚地说：“伯承兄，小弟向你赔罪了。”刘伯承说：“彭总，别这样说……”战后，尽管刘伯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一二九师的官兵对彭德怀意见很大。

但是，刘伯承在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是对整个晋冀鲁豫抗战工作的总结。而且，刘对这些问题结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令刘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伯承在报告中提及百团大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方面这是党内、军内在正规的场合首次对百团大战作出的批评性评论。对于百团大战，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唱过赞歌，毛泽东也曾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发过电报：“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后续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因而在党内军内形成了颇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非正式场合的。刘伯承的报告则是首次在会议上对百团大战提出意见。另一

方面，刘伯承在报告中提到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不够的问题，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共鸣。抗战初期，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彭德怀对游击战的概念把握得不太准确，对王明提出的“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没有加以反对。因此，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于彭在游击战问题上以及百团大战的批评，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百团大战的争论给彭德怀带来了很大的政治麻烦。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开前后，在延安断断续续召开了为时43天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会议原本是为了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但由于康生的发难，加之受到中共整风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影响，转变为一边倒的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将彭德怀传达过王明的讲话批评为执行王明路线，将彭德怀的工作失误批成错误路线，将彭与毛泽东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批为闹独立，等等。甚至一度出现否认一切的极不正常现象，连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也成了“带着入股思想投机革命”，“彭得华”的名字，被“上纲”为包含着政治上的野心。百团大战更成为批评的焦点，如“百团大战是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战的动机不纯，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挥鲁莽、蛮干”等，有的还扣上吓人的帽子。

1958年6月29日，毛泽东召集第二次组长座谈会。

毛泽东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说：“苏联打败过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

林彪插话：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毛泽东：“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

毛泽东强调：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①

会议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

^①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958年7月10日，刘伯承抱病到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上作检讨。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沉重的步子，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掌声大作，延续大约半分钟。

刘伯承客观地说明了一些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刘伯承说：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作为课业之用；在校正苏联红军1944年野战条令时写了序言，着重阐述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学习外国经验的指针。

刘伯承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不是专讲“十大打击”，更不是如林彪所说“专讲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把本国的东西当成土包子，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萧克也在会上作了检讨。

会议给萧克、李达戴上“反党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蔡铁根在会上作了说明：“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竟被当场摘掉军衔和帽徽，赶出会场，关押起来。^①

1958年7月19日，彭德怀作会议总结。

彭德怀说：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坚决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军建设和作战的指针，必须以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学习外国经验，绝不能盲目地机械搬用。

他说：军事训练应当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以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为依据；以我军经验为主，注意研究敌人的情况；从我们现实情况出发，又照顾到未来可能的发展；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我军战斗力，加强战争准备。

他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

彭德怀说：“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

^① 蔡铁根，1959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军籍，降为行政15级，安排到江苏省常州市工业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诬蔑他为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1970年3月17日被杀害。1980年1月8日，中共常州市委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①

1958年7月22日，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某些个别同志，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30多年的历史；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会议通过《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

此后，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200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3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反党分子”。

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说萧克、李达：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主义。

同时，高等院校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

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③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改。

二、纠“左”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经过了3个月的大办公社、大炼钢铁。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到农村察看。各地也不断报告许多情况。

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毛泽东决定到河北省去看一看。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河北省会天津市，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毛泽东

①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556页。

②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因病去世，10月27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大会，悼词中说：1958年，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批判中，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③ 1978年11月7日，总政治部下发《关于萧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撤销了不公正的结论。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萧克、李达等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的通知》，为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人彻底平反。

再次同他们谈话。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

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及徐水、安国、唐县、正定4个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毛泽东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调查，21日向他汇报。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19日一清早，毛泽东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省遂平县嵒嵒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半小时后，毛泽东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胡绳、李友九同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调查汇报，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一亩白薯产量不到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供人参观；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产”；分配实行供给制。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毛泽东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徐水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

10月23日，陈伯达到达河南以后，毛泽东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的调查，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10月26日，毛泽东又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省新乡地区做调查，一个是修武县，全县13万人口，以一县一社闻名；一个是七里营公社，一个乡，是全国第一个打“人民公社”牌子的。

28日凌晨4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如果遂平调查完毕，可以去附近某一县再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

毛泽东从实际工作发生的大量问题中，首先发觉办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产品无偿调拨、剥夺农民等问题；与秋季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因为中央已经发出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毛泽东于10月31日傍晚乘专列离开北京，沿途在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等地约见省、地、市、县各级领导人谈话，如饥似渴地了解情况。

11月2日，毛泽东到达郑州。^①

1958年11月初开始，毛泽东着手纠正这种错误，连续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郑州会议于1958年11月2日举行，中央部分领导人、各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开会地点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11月2日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毛泽东主持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人民公社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②

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湖北、山西、山东、安徽、湖南9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吴芝圃、张德生、张仲良、王任重、陶鲁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

毛泽东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③

这次会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说：就在这里起草，并指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85—888页。

② 《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前期纠“左”的努力》，《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第3页。

③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89页。